

10. 13



增刊  
R  
12  
20

新増文庫



1987

# 目 录

## 编辑说明

### · 费孝通教授访问江村五十周年纪念 ·

- 一、费孝通的家世和学校生涯…〔美〕R·戴维·阿尔  
克斯著朱通华译(1)
- 二、费孝通与江村……………吕锦华(21)
- 附：费孝通的补充说明 (25)

### · 人 物 轶 事 ·

- 三、为祖国中医事业奋斗不息……………胡连峰(28)
- 记袁鸿寿教授
- 四、我所走过的音乐之路……………杨继陶(31)
- 五、为父亲费伯坝再赞一辞……………费鲁直(36)
- 六、明末民族英雄——吴易……………程 明(39)

### · 经 济 史 话 ·

- 七、同里“谷香村”茶食糖果店创业琐谈……孙君正(43)

### · 名 胜 古 迹 ·

- 八、乡情……………李冷路(46)
- 九、水乡古镇(游记)……………钱 波(51)
- 十、同里十六景及续定四景考释……………王稼冬(54)
- 十一、陈从周教授谈退思园……………(57)

- 十三、我忆罗星洲……………王友松(58)  
十三、松陵镇七阳山的变迁……………庞绶荪(61)

### · 记 事 诗 ·

- 十四、芦墟新竹枝词十一首……………柳义南(63)

### · 回 忆 录 ·

- 十五、同里杂忆……………冯英子(65)  
十六、关于吴江蒙养院情况片断回忆……………钱家鳌(74)  
十七、盛泽丙寅风灾记……………周德华(76)  
十八、田寿山部队突击日寇目击记……………任传济(79)  
十九、曲坛琐忆……………许缀石(81)

### · 谈 文 说 史 ·

- 二十、弹词《珍珠塔》故事调查……………王稼冬(85)  
二十一、舜湖逸社票房发展史……………唐幼良(103)  
二十二、赋“退思”以新义……………倪 平(107)

### · 风 土 志 ·

- 二十三、黎里镇八月迎神赛会盛况……………邵文长(109)  
二十四、熏豆与熏豆茶……………徐文初(111)  
二十五、闵家薄荷糕和莺湖金眼脰银鱼……………周明荣(114)  
二十六、平望辣油、辣酱、蜜汁黄瓜的由来……………鲍乃梁(116)  
二十七、小云台的来历(民间传说)……………陆铭之(118)

# 费孝通的家世和学校生涯

——《费孝通传》第一章

[美]R·戴维·阿尔克斯著 朱通华译



费孝通，是以写中国农民而著称于世的，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农家子弟，而是出身于小城市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曾在日本留学，时间不长，后来从事于教育工作。

费孝通生于1910年，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的前一年。几年之后，他在古老的科举制度已经废除的情况下，先是进了几年小学，后来又进了美国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直到出国深造。他受到了非传统的西方与东方相结合的教育。

他后来写了那篇“水土流失”的文章，认为农村社会天然

哺育出来的领袖人物，已经流散殆尽，现时代必然要抛弃那些  
缙绅式的学者。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的双亲从农村集  
镇迁到苏州的一个县城，他和他的兄弟、表兄弟们则到了北  
京、上海或国外。这个家庭的大多数成员离开了农村，卖掉了  
他们的土地来到城市，就学国外，接受了西方的观念，选择了  
现代的职业。从他和他的亲属们的经历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历  
史过程中的种种：传统观念的变化，书香子弟的都市化、西洋  
化，现代知识分子从中国广大农村社会中分离出来。

## 吴江和苏州时期的家庭及其童年

东流入海的长江，把江苏省一分为二。江南土地平坦，湖  
泊众多，运河蜿蜒其间。那里堪称水网地区，船舶是交通的主  
要工具。这块地方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是鱼米丝绸之乡，是  
中国近百年商业发达的富庶之地。同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  
孕育了许多著名的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上海向西不远，大  
运河边上，有个苏州城；苏州城之南，太湖之滨，有个吴江县。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那里成为既接受西方影响，又受到长  
江、黄海会合点的上海这个欣欣向荣的大城市影响的一个地  
区。

费孝通的祖先们，无疑是有教养的人和社会的精英，虽然  
他们之中没有出过高官显爵。他们看来在士绅中享有声誉。他  
的一位表叔记得，费家在吴江大约有几百亩土地，但都在  
1900年卖掉了。这同费孝通1950年所说的是符合的：“我出  
生于地主家庭，到我祖父手上已经衰落了。”他的祖父死于  
1890年，那时费孝通还未出生，据说是一位生员或是一名布  
衣，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费孝通的祖父住在同里镇——

吴江县的一个农村集镇。在那里只有三四个也受过教育的人，其中有一个杨敦颐，是他的朋友。费孝通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的小儿子（费孝通的父亲）部分是由杨家养育的，并同杨敦颐的女儿结了婚。

杨敦颐，费孝通的外祖父，在事业上有着很大的成功。1885年，他通过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的生员考试成为一名拔贡，这相等于一名举人的资格。从1890年到1895年，他在镇江丹徒县担任教谕，一个位置很低的官员。后来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写了小学生识字课本和一组纪念妻子的诗，并在1912年出版了他所收集的反清革命文集。他死于1928年，享年仅七十岁。那个时候，费孝通十八岁。从后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杨敦颐先生是一位留着长胡子的慈祥长者。

杨家在同里拥有一家轧米厂、一家油坊和一些土地。当他们1905年搬往上海以前，同处理土地一样，这些家产一起卖掉了。看起来他们生活比较富裕。杨家的十一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大多数成为学者。他的长子杨天骥（千里）的成就尤为突出，在1902年获得了优贡的身份，后来成为上海激进的新闻记者，又在许多衙门担任过职务，包括担任过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顾问，出生地吴江的地方官。他于1958年在香港去世。次子杨锡纶（本书有关这个家庭的许多资料来自于他），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并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早去美的一个成员的女儿结了婚。第三个儿子是北京的一位建筑师。另一个儿子在Walt Disney工作，后来成为美国公民。一个儿子和若干个女儿是基督教徒，包括他的长女、孝通的母亲。

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庵生于1879年。他所受到的教育，部分得自杨家，部分得自现代学校。他通过了生员考试以后，在

日本留学了两年，当时，有着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到西方去寻求新知识。回到中国以后，他把家搬到吴江城，在那里办了一个中学。他的儿子后来曾经自豪地写到他的父亲尽力为家乡服务的业绩，包括那个为了减轻人口压力而开垦太湖的计划。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费朴庵和几个朋友从上海回来参加了解放苏州和吴江的革命。他被选为新组织起来的吴江县参议会议长，但他拒绝听命于新政府的第一任头头。他到南京的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去担任督学，后来到苏州的一所中学去教语文。凡是我所交谈过的他的亲属都认为，费朴庵对他的孩子们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身材矮胖，精力充沛，豁达大度，乐于助人。他属于性情开朗的人，所以很愿意接近孩子。他有时自己教育孩子，也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读物。对孩子们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威严的父亲；不如说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他总是尽量鼓励孩子们树立起自主、自立的精神。1962年他住在苏州时还精神抖擞，费孝通去看过他，还在报纸上写到他。他1972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原文如此，应为九十四岁。——译者注）

费朴庵于1900年同杨纫兰结婚，后来的十年内先后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费孝通是最小的一个。杨纫兰在那个时代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先是在她父亲那所中学里教国文，后来又在吴江城创办了一个幼儿园。在她的一个姐姐的影响下，或许还有在苏州办了一所医院J·R·威尔逊——一个美国传教士、她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影响，她成为一个基督徒。1927年，她快要五十岁时，因肠病去世。孝通那年才十六岁。

费朴庵的四个儿子，统统离开故土成为国际或国内舞台上的人物，其中至少有三个颇著声望而能列入名人大辞典。大

儿子费振东，生于1904年，在上海读的大学，后来显然由于左倾的原因而逃亡海外。从1927年到1948年，他生活在东南亚。他以新闻记者和教育家的身份活动于印尼一带。五十年代，他同许多华侨有很多来往。第二个儿子费青，生于1906年，曾留学德国，后来是北京大学的法律教授。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舞台上他颇为活跃。当他1957年去世时，政府机关报《人民日报》以显著地位登出了讣告。费霍，第三个儿子，唯一不太出名的一个，似乎是个工程师，抗战期间在国民政府或军队中服务，六十年代逝于上海。

只有大姑娘费达生，仍然留在家乡工作。她排行第二，生于1905年，她是二十年代早期，在靠近苏州的初级蚕桑学校毕业以后，到东京一个学校去上学的。她后来回到苏州的这个学校任职（1950年同这个学校的校长结婚）。她毕生从事于在家乡改进丝绸生产的实验。她的在农村搞改革和组织农民搞工业的经验，给孝通以巨大影响，后面还要讲到她。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吴江城内（松陵镇），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十年。这是一个冷落的小镇，商业还不如城东四英里的同里镇发达，因为同里镇是大米贸易中心。人口估计不过一万（全县约50万人）。城周不到两英里，而且城内颇为荒芜。他住在松陵镇上的一所大房子内，有一个花园。他家拥有一小部分土地，在城内还拥有一些桑园，可以用来养蚕卖茧。一个亲戚还记得，有一次用船送孝通到太湖去看荷花，回来时遇到暴风雨。为了躲避战祸和军队的骚扰，费家曾经躲到乡下去。父母双亲，五个孩子，一个祖母，还有一位守寡的姑母，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们不算富豪，但还雇得起佣人，过着舒适的生活，那时，费朴庵正供职于南京的江苏省教育厅，大概是个科长。

孝通在本地公办的小学里读了四年书。在这个地区，进学校是少数人的特权。到1922年，在他那个年龄层中，他是从小学毕业出来的七十八个男生和三十五个女生中的一个。学校的课程是中央政府1916年制订的，内容包括：每周8~14小时的中文、作文和书法课，4~6小时的算术（包括珠算）、2~3小时的修身课。另外还有中国历史和地理、自然（科学）、体育、唱歌、劳作（手工）、画图，第六和第七学期有一门外语（一般是英语），约16~17节。费孝通喜爱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从中学习历史知识和若干特殊知识。课程之余就偕同同学到鲈香亭去漫游。这个地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己后来写道：或许正是老师的指引，使他把注意力放在农村，因而使他在三十年代又回到本地进行调查研究，出了第一本书（《一访江村》）。

在孝通十岁那年，他的家庭从吴江迁到了苏州——运河边上的小城市。苏州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马可·波罗写到过它），以悠久的文化、出美女和人们爱好享受闻名于世。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大运河，古石桥，深深的小巷（只能通过轿子和驴子），诸多的历史遗址、花园和茶馆。1920年，苏州大约有30万人口，并开始同西方人接触。1896年开放了同外国贸易的码头，有轮船通往上海、无锡、杭州以及其他城市，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又建起了沪宁铁路。1930年，这个城市装起了电灯、电话，有四个电影院，还有一对对的外国人，包括数十个美国传教士。

在苏州，孝通进了离家不远的振华女子中学。这个学校是由王季玉主持的，她是一个基督教徒。她1916年毕业于蒙特华莱克，并获得了伊利诺斯州大学的植物学学士。她的姐姐王季昭，也在这个学校工作，是1915年毕业于普漠那的。

后来费孝通是这样描述这位女校长如何献身于她的事业的：“虽然以她在海外获得的地位，尽可以在上海取得一份好工作。然而她留在振华女子中学的岗位上，每当冬天的早晨，伸出红肿的手在黑板上写字，给学生上课。”王家姐妹们是孝通母亲的朋友，杨敦颐从同里搬到上海之后，把上海的古装书捐赠给了这所学校，这就是孝通为什么被送进了这个女子中学读书的原因之一。他显然不是在那里就读的唯一的男孩子。但他曾是女中学生这一点，后来常常成为同他开玩笑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对于这一点，他本人也非常敏感。过了几年，孝通母亲去世了，振华女中的一位教师——他母亲的一个朋友去安慰孝通，十六岁的他竟羞于在同学面前与一位女中教师见面而逃了出来，而且没有说一声“再见”。

## 教会学校：振华和燕京

后来的十二年，费孝通一直在美国新教徒所办的教会学校里受教育。从1922年到1928年，他就读于东吴大学的附属中学。东吴大学是中国十六所教会大学中的一所。这些教会大学有十三个是由当时在中国的新教徒主办的；有三个是由罗马天主教徒主办的。后来他转学到另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了两年，然后1933年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费并不是因为信教的原因才进了教会学校，他和他的父亲都不是基督徒，尽管教会学校里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都信了基督。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些学校的新颖性当然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的，而是作为在中国改革普通教育的一种方法，包括把英语作为重点课程。这种改革，引起了那些好学或有商业背景的青年企图到外国留学的兴趣。

许多教会大学都有着它们自己的附设中学，形成了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教育体制，同政府有着不同的系统。费所在的东吴大学第一附中，座落在该校校园的右边。这是一所颇有美国风味的大学，绿草如茵，大树参天，西方型的教室和宿舍。据现有资料，在1929～1930年，这所中学的十八位教师都是中国人，除了曾经一度兼课的十二位大学教师以外。必读课程是中文、英文、数学，每一门课程都由教师来打分。教师数量的多少决定于对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它们的次序是：中文、英文、数学，然后是自然科学、中外历史和地理、方言、国画、宗教和体育课程。传统的孔子学说当然列在中国语文课程内。但最重要的还是现代西方课程，占了更多的时间。在二十年代中叶，当孝通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年代，东吴的人们多半信教，其中有的是奉命去做礼拜和听教义课。

这种根据教义办事和由外国人控制的教育制度，在二十年代愈益受到中国民族运动的打击，其结果必然从多方面影响了孝通的生活。在费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的时候，1919年发生了反对礼教的“五四”运动。当费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做一个反宗教的中学生的时候，就为“收复教育权”而激动，并听到了教会学校是帝国主义走狗的指控。1925年英国警察枪杀中国工人示威者的上海“五卅”事件，使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重新高涨起来。在东吴大学，当时学生没有什么行动，但有一小群青年教师发表了一个宣言，号召全体外国教师坚决地站在中国人一边。当北伐期间，1927年3月发生了南京事变，那里出现了排外和南京一所大学的美籍副校长被害的事件，许多外国人离开了中国，东吴大学的一些外籍职员也因安全的原因躲避到离苏州一百多公里的上海去。后来他们又回来了，只是躲避一下激进的学生。最后，学生们在政府的威胁下

回到了教室，全体教师在六月末都回来参加了毕业典礼，学校在没有外籍教师的情况下坚持了三个月。

虽然孝通的两个哥哥在政治上显然都是激进的，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孝通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一般说，教会学校中的学生激进程度，要比公办学校的学生差一些。学生积极分子的抱怨之一，就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常常游离于学生运动之外。当然孝通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在学生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空气的感染，但他也不曾被中国的混乱的政治搞得昏昏然。触动他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1924年，一次是1925年，军阀之间的战争公然打起来了。这两次战争，使东吴大学和附近的中学，推迟了一个多月才开学。

到1928年，费孝通完成了中学的六年课程后进了大学。东吴大学是十九世纪末叶由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建立，经美国田纳西州特许的。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里已经有三十六位教师，其中三位哲学博士和十五位文学硕士。二十二个是中国人，其中有六人曾就学国外。那时只有三百四十一名学生，教室也很少。学生大半来自江苏、浙江和广东，这是受西方的影响最深的三个沿海省份。不少于14%的学生来自教会中学，三分之一还多的学生来自东吴大学的三个附中。1928年招收了第一批女生。男学生都住在学生宿舍内，他们穿着长袍，有时也穿西装。

还搞不清楚这时的费孝通专心于什么课程。他的一个表兄认为，他最初是录取在医科预科的，但是他不能忍受解剖学——这是他后来的一位朋友所断言的，因而费曾在生物学上花了多年的功夫。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好学生：在第一学年的春天，他是整个年级一百二十七名学生中的十个优等生之一；到下一个学期他成了全班六个高材生之一。他开始对女孩子

感兴趣了。后来自嘲说：“我的大学生活，是站在女生宿舍的门外喝西北风。”在优等生中有一个女生叫杨季康，他爱上了她，她后来同散文家钱钟书结婚了。她后来的名字叫杨绛。孝通取了个英文名字，S·T·Vee，大概是反映了他的吴语方言。在《苏州年鉴》中有一张照片——一张十足美国派头的照片，照片上在一起的有高年级学生、教师、俱乐部成员、球队等等——可以认出他来，戴了眼镜，打了领带，穿着茄克衫。他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生，是这本年鉴通信秘书（杨季康也在这个编辑部。教师中的顾问之一是著名的作家苏雪林）。1930年，他向“年鉴”投了第一篇稿子，幽默地用文言文叙述了他在上海教会大学读暑期补习班的体验。

在东吴大学读了两年之后，费孝通转学到北平的燕京大学，开始读社会学的课程。燕京大学建立于1911年，形式上是属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两派合并后的教会学校（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校园是美丽动人的，教室和宿舍的建筑有着新的风格，包括一个外形象宝塔的水塔，还有一个湖。它座落在尘土飞扬、污物遍地的闹市之西北角，原来是臭名昭著的十八世纪的大贪官和珅的财产。从1919年到1941年，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一位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教过一个时期的希腊文，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他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把学校从摆脱老朽的传教士、起用新进的中国学者中支撑了起来。到1930年费孝通进燕京大学的时候，燕京已经是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了，可以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类国立大学相媲美了。她也有着上千的学生，学生与教师的比率是四比一，有着一个藏书大约二十五万册的大图书馆。

本世纪二十年代教会学校内爱国教徒们的斗争，迫使政

府当局明令禁止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而且要求由中国人代替外国人管理学校。但实际证明，以前的管理方法远较后来的更有效。孝通呆在燕京大学的这个时期，宗教已不再是这个学校的目标和生活的中心。到1930年，只有37%的学生和35%的教师是教徒。实际上，宗教课程和宗教仪式已经为政治灌输所代替。必修课程是国民党“党义”、军事训练和每星期一早晨的“国父纪念周”。当然，学校主要还是控制在外国人手中，司徒雷登无论如何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四分之三的预算来自美国政府，而他是这笔庞大资金的筹集者。学生在这里受到高质量的教育，只要花费不过20%的费用。

燕京大学在许多方面都很美国化。看起来俨如中国式的校园和建筑物，乃是纽约建筑师设计的，后来大多被以美国捐助者的名字命名。教师中为数不多的美国人，大多是传教士，薪水是教会开支的，高于那些中国教师。中国教师中，很多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因此，许多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都是英语讲授。传统的中国教育没有给妇女和体育课程以一定的位置，但是在燕京大学，约有30%的女生，并且鼓励他们同样参加运动会。燕京实行的是美国的模式。每节课长达50分钟。新学年从每年九月开始，毕业典礼在六月举行。四年以后，一定的课程修业合格，被授予两张文凭，一张来自中国政府当局，一张来自纽约的美国当局。

燕京的学生来自比较富有的和有西方背景的家庭。拿东吴大学来说(原文如此)1931年有74%的学生毕业于教会中学，这得益于一条近亲繁殖的路线(一个优秀的毕业生接着成为教会中学的教师或校长)。燕京获得富贵学校的名声，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笔慷慨的国外资金，要送一个儿子或女儿进校，学费、住宿费、膳食费将是昂贵得不

胜负担。据说，在1928年，这笔开支要比一个劳动者整整一年的薪水还多得多。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得到财政补助，但是更多的学生要靠勤工俭学和小量借贷，因为那里只有十二个奖学金名额。从地域上看，沿海地区的学生比内陆地区的学生更热衷于接受西方的影响。1930年，来自广东的学生占的比例很大（广东人占23%。而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的学生约占2%），其次是河北、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这六个富省共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关于这一点，一张学生家长职业调查表表明：38%的家长是商业界，9%是银行、交通、工业界或工程师，15%是教育界，14%属于政界（包括1%在军界），12%属于医务界、宗教界或其他社会阶层。学生家长的大多数人在城里供职，他们需要现代教育。从事于农业这个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从事的职业，学生家长中只占11%，他们中间许多人可能是地主。

最重要的一点，燕京是一块同周围环境迥然不同的小天地：一个可爱的校园，设备完善的实验室，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和运动场。一批来自上流社会并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教授。在一个贫穷和问题成堆的国家里，燕京的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训练，那里既弥漫着民族献身精神，也被灌输着宗教信条。这都同时渗透到一代优秀分子的意识里。

这种社会责任感和精神的表现之一就是爱国主义活动的兴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帝国主义走狗的打击下被迫处于守势。到了三十年代，在1931年日本人入侵满州以后，民族仇恨的对象就改变了，学生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可以参加爱国活动，燕京的学生们特别活跃。他们组织示威游行，他们到内蒙前线去同日本人打仗。他们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燕京的学生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发

起者。这些积极分子，部分由左倾分子所控制。他们竭力反对那个对日本侵略者持不抵抗主义政府当局。孝通大概就是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夕，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的时候，离开燕京和北京的。但是，早在日军入侵满州的时期，他和他哥哥费青曾经翻译过一本由英国水手所写的目击记，描述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在这本书里，他们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序言。序言痛斥了在这场冲击中的那些胆怯和无能之辈，痛感一个国家的安宁只有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战斗中取得。

从整体看，那时的费孝通还不是学生中政治的、宗教的、体育的或其他方面的积极分子。他的高班同学杨庆坤（曾经参加过内蒙前线的抗日战斗）说过，其他的同学也同意这个说法：“费当时在政治上是默默无闻的”。他的爱好是把时间花在同知心朋友或志趣相同的人（如杨庆坤、林耀华等）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方面。尤为突出的，是他为钻研学问而表现出来那股发愤劲儿。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他没有为前途烦恼，却是为繁重的每一门功课，为求知的目的，为每年诸多的考试而操心。他把考试看得那么严肃，以至许多年后还常常梦见考试的情景！

费受到的教育，不仅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不仅在城市，差不多在全中国。不到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文学硕士了，也结了婚。他到中国的野外去考察，又到国外去留学了两年。他同许多中国人——如胡适——不同。胡适他们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开中国，在国外留学多年，从预科读到毕业，因而对故土感到不习惯，对中国有陌生之感，甚至不时的会忘记说中国话。费孝通从来不是这样。他奉行着“金窝银窝，不如家里草窝”的信条，他理智地同传统决裂，然而又是把中国的社会问题置于一切问题之上。

## 费孝通是一个“人”

从这样的背景和经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费孝通个性的多方面的成因。他无疑是欧化了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不费力地阅读英文书籍，流畅地用英文书写。他的口语很流利。虽然读音很重，不那么注意文法。他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有用词不当之处（我手上就有着被打了个问号的信），但叙述清楚并善于表达。更妙的是他不时夹进一些精辟而幽默的中国谚语，把它当作英语词组来用。诸如把“象牙之塔”写成 ivory tower，把“恶性循环”写成 vicious circle，把“旧瓶装新酒”写成 new wine in old bottles（当然，有些同时代人，这方面更甚于费）。他的学校生涯反映到他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动不动引用圣经或宗教语言。比如“我们的祖先在伊甸园”。“我们之中谁敢投第一块石头？”“上帝赐予人类的严峻考验”，“我何日进天堂呀”等等。读到这些，我们或许不必感到意外，正如在剧院里，直到把每个人都介绍完毕，不会有人自称比莎士比亚更高明。但中国人当被告知：有一个地方，那里竟然痛恨葡萄和牛奶，他们就大吃一惊了。那就是天国，那里“每一棵树上挂满了葡萄，每一条河里流的是牛奶”。

更为重要的，我认为，费为了寻找灵感和主张，只能从西方的社会科学得到，而不能指望中国的传统。这些知识分子的天性是扎根在下面。他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可以作为这一迹象的脚注。这是一本论述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家庭功能和亲属关系的模式的书。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你了解费着重研究了哪一类事情，至少在这个论题上。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不少于四十三位西方学者的著作。马林诺